

集 論 鄉

著 艾 先 塞



行 印 局 書 通 文

書 著 藝 文

集 談 鄉

著 艾 先 塞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貴陽再初版

文藝書鄉談集一冊

筑版黔元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印究必

著作者 蔡先 艾榮

華問

問

榮

印 刷 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上 海 廣 州 長 沙 重 慶

發 行 所 文 通 書 局

成 都 貴 銳 昆 明

再版序

接到昆明文通書局的信，據說我的「鄉談集」預備再版。也好，藉此得到了一個修改正的機會。雖然這本小書其實平常，我却始終不無敝帚自珍的心情。

談到寫雜文，我可以說是十足地外行。雜文需要的是一種精到的見解，也需要一枝犀利的筆鋒，在中國，只有魯迅先生獨步一時，其他的人都望塵莫及。

我愛讀純文藝作品，同時我也愛讀鋒銳諷刺的雜文，只要在雜志或者報章上發現這一類的文字，我決不肯輕易地放過它們。自然，有時也見獵心喜，而結果仍然戰慄難移。

民國二十六年秋天，回到貴州以後，貴陽幾家報紙副刊的編者，不知道從那裏有聽到我也會寫寫文章，紛紛寫信來，或者親自來要一點作品去噴刷刊登。我這個人要多說太長，登在報上，不大適合；散文既難寫，且易爲讀者所忽略。因此我就針對着當時的社會與推敲的時間都沒有，熱炒熱賣，自己都有一種「平淡之感」。這於是就成爲一本書了。

另一部分是我的幾篇「學習寫作的回憶」。它們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寫成的：民國二十七年，省立貴陽中學約我去講演，限定要我講寫作經驗。這個題目，用不着搜索枯腸，落得我拉拉雜雜地亂談了一陣，就把難關渡過去了。誰知有兩位同學還替我做了一個記錄，事後送來請我校閱，說是打算在報上發表。因爲有幾處遺漏和錯誤，我又懶得去改正，率性把記錄都撕

下了，寫信告訴他們說：記錄不必披露了吧，等我將來自己來寫。這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但是想不到有幾位老實的學生總是寫信來催，把我倒弄得躊躇起來。不久我和謝六逸，李青崖，齊同，張夢麟，田賛禹諸先生在貴州晨報上創了一個「每週文藝」由我負責集稿。他們幾位寫文章都狠矜持，只有齊同寫得稍多。刊物每期需要五千字左右，投稿又不能用，我便一方面爲了償還這筆宿債，一方面爲了給我們的週刊補白，便連續寫成了這麼幾篇回憶錄。記得有一次某君在「文藝陣地」的通信上說我發表此作，大有資青年們跟我學習的意思，則吾豈敢。

爲了便於保存起見，三十年我把兩部分湊攏來，編成一本集子，交給文通出版。命名「鄉謠集」，並無深意，亦無典故；不滿願手寫了這兩個字，謂之爲鄉下人的談天，或稱故鄉的雜談皆無不可。這本集，最初原想獻給幾個鄉下朋友，倒是真的。

本書初版，誤植太多，已盡量改正；錯誤處仍難免。又依照書局的建議，先後次序，略有變動，合併申明。

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於貴陽花溪

目 次

第一輯 學習寫作的回憶

我對於文學是怎樣發生興趣的	一
我的第一首詩和第一篇小說	四
辦刊物的失敗	四
向想著的路途走去	八
從「朝霧」到「鹽的故事」	十四
翻譯的嘗試	十八
我與文藝會社	二三

第二輯

作家的出處	二九
規範	三一
我們怎樣紀念「五四」	三三

一年間	三四
文人的分散	三六
與老百姓無關	三八
關於沉默	四〇
分工合作	四二
標語	四四
飢餓與救濟	四六
魯迅先生的偉大	四九
「苦雨齋之羣」	五一
從聽戲說到鄉下演戲	五三
一個新的戰鬥的堡壘	五六
一個先決問題	五九
生活與時間	六〇
我的苦悶	六四
關於「中國的小說」	六七
作家的養命	七一
略論寫作	七四

第一輯 學習寫作的回憶

一、我對於文學是怎樣發生興趣的

我是……個沒有受過什麼好的小學教育的人，僅僅在北平的北師附小進過一年高小三年級。民國八年以前，我都在故鄉（遵義）的私塾讀書，我的塾師，前後一共換過四個人，我現在還很清晰地記得他們的名字：徐小儒，秦繼堂，李觀慶三位先生，還有我的堂兄式之。但他們對於學生，除了責令每天把書堆成寶塔似地背誦之外，頂多一個星期做兩篇作文；他們不約而同的都獎勵我們摹仿「東坡博議」的筆法，從來沒有講過一課書，（那時的塾師大概都是這種辦法吧！）所以簡直沒有給我什麼影響。

替我築下一點點文學的根基的，反而倒是我的父親，他是讀清的舉人，在遵義當時也稱得起一個文士，他的古文和舊詩都做得很好，他的著述，據我所知的有「仲常詩稿」「瘡僕吟」、「歸田雜著」三種，而印成書的，却只得「瘡僕吟」一本。我記得那時他每天都給我講一編古文，並且指導我讀幾頁「資治通鑑」，教我聯句和做詩。他在天主堂定了一份「崇實報」，自己看完以後，就遞給我，用訓示的口吻說道：「做一個現代的人，就應當明瞭一些現代的事實，所以我們是要看報的。」他有時還把福音堂送來的「歐戰畫報」，一張一張地講給我聽。他常和福音堂的牧師天主堂的司鐸來往，居然能說幾句英語和法語。雖然他是一箇五

十歲以上的老人，但是他的腦筋一點也不陳腐，在他的書案上，我發現過幾本新書：「魯達擗
爛流記」、「圓石案」、「黑奴籬天錄」。我得到他的允許，都拿去看了一過，他是幼年時代給我
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一人。

我在兒時一方面還喜歡讀舊日的章回小說，這種興趣，是從母親路過重慶買來的那部「封
神演義」所引起的來，後來就弄到一發而不可收拾了。我們那時住在遵義老城楊柳街，距離小
十字一家湖北人姓熊的開的書舖最近。每逢得到幾個零錢，便和堂兄先驛在那裡去買舊小說。
因為自己的購買力太薄弱了，所以還是常常同親友借閱的時候居多。同時把買來的書，總是保
持得十分清潔，看完便拿去和朋友或書舖交換，間或也找補書舖幾個錢，有一次，我曾經拿一部「三國志演義」同一部「列國志」去跟一個劉某換得一部「彭公案」。後來才知道這部書雖
然情節熱鬧，而筆墨却比前兩種書差得多；但已經上了當，後悔也來不及了。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我的父親送我到北京（當時還沒有改名北平）去讀書。他老人
的目的既然達到，不久就轉回家來，病故在途中。不幸得很，我的母親第二年也跟着去世了。
於是我在一個少年的生活便變得非常孤獨與寂寞，思想時常容易跑到悲觀的路上去，這種苦
難越發使我接近了文學。我那時的性情極為沉默，喜歡一個人悶坐在家裏玄想，不大和人們往
還，我高興收買古書，我拿書籍來排憂解悶。還有一點，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在放鄉的時候，
讀的中國書，委實太少了；雖然進了中學，功課每天都在忙碌中，但一回到家來，手裏總是抱
着一本的線裝書，連到了吃飯的時候，都捨不得丟開去吃，簡直成了一個「書癡」。

一年以後，我每逢星期日，都到宣武門大街通俗圖書館去閱覽，有幾種嶄新的刊物開始和

我接觸了，那就是「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創造」和「晨報副刊」。在接到了那些新的精神上的食糧以後，我的精神突然百倍，枯寂的心也變得活躍了起來，覺得在無邊的黑暗沉沉中，彷彿誰給燃上了一支火炬似的。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動，我恍然大悟了，我是一個現代的青年，不應該一味在故紙堆裏打轉，應當努力地去接近現代的文化和生活。我由雜誌而轉到專讀一些純文學的作品。最初我頗喜悅讀國內新文學初期的作家們的創作，逐漸地培養成了些許欣賞的能力之後，我便進一步去讀那些外國名著的翻譯了，文言方面，我讀了林琴南先生譯的「說部叢書」；語體方面，我讀了耿濟之先生譯的「復活」「父與子」，沈鈞先生譯的「前夜」，安壽頤先生譯的「伊必丹之女」，胡適之先生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這幾種。

那時，我在中學讀莫爾兩年多的書，英文已稍稍有了點根底，可以查字典看淺近的書籍了，我最先試讀的文學書是莫泊桑和柴可夫斯基兩個短篇選集的英譯本：「菲菲小姐」和「羅士其德的提琴」。我覺着它們比譯本有趣味得多了，像這樣的小說，多少還能領略一點原作的風趣。讀完胡譯的短篇小說集和法俄兩位大家的名著以後，我也就略略知道一些短篇小說的模型和作法。

在那個時期，我還不敢冒昧地去嘗試，讀的數量，其實已經大有可觀了。見獵心喜的心情並不是完全沒有過，但是一想到創作方面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年齡，學識，經驗，都相距得太遠。又隔了半年，才開始學寫一些幼稚的、不成器的東西。我的決然地走上這條艱苦的路程，可以說完全得力於三位朋友的勉勵；如果沒有他們。本人至今決不會有提筆的勇氣。

我的這三個朋友，第一個是朱大椿先生，四川巴縣人。他是一位應命的散文家和詩人。郁達夫先生「新文學大系」的「散文二集」中，朱自清先生在「新詩集」中都還得有很多繼他的

作品，惜乎他只活了二十幾歲就死了，但與英國的詩人鴻慈一樣，是死後才為人所知的。我的寫詩完全是他督促的結果。徐志摩先生第二次辦「詩刊」，還要邀約他的詩譯，他早已不在人間了。第二個是李健吾先生，由西安邑人。他是現代有名的喜劇作家和福樓拜專家。中國喜劇而懂得成功的，恐怕他還要算第一人。對於福樓拜的小說的介紹，他也非常努力。他還寫過小說與文學批評。在目前的文藝界中，他不愧是一位多方面的工作者。他在這十年來給我的影響最大，隨時隨地都在以一個詩友的地位鞭策着我，使我一點不敢懈怠下去。還有最後一位是程頤西先生，湖北安陸人，他是詩人、散文家和翻譯者。「小說月報」和「文學雜誌」都發表不少他的詩文。他翻譯的名著有安特列夫的「紅天」。嘉樂爾的「鏡中世界」，白恩士的「紅的，紅的玫瑰」，赫斯的「夢幻與青春」四種。他們三位都是我的文學道路中的最忠實的旅伴，先是大密互相研究，討論，後來則驟寫一些作品出來，彼此翻譯，這樣就把我們對於文學的趣味，一天一天地提高起來了，不幸的是三個好朋友，在中途偏偏損失了最聰明的朱大樹先生，這是我終身抱恨的一件事。

一、我的第一首詩與第一篇小說

我們這一輩青年最初學寫作品的時候，是僅有「創作慾」而無「發表慾」，只要東西一產生出來，就心安理得，更說不上計較文字的工拙了，自然也不會想到去公諸於世。我們又深知這，在文壇上，一個無名小卒，要找出路，絕對不容易。那時我們經常的讀物是「小說月報」和

「農報副刊」。『小說月報』要一個月才看見一期，常常令人等得十分焦急。「農報副刊」每天都有「張，這倒比較痛快。我每天早晨，下了第二堂課，便要到學校的圖書館去找『農報副刊』看的。當時同學中愛看副刊的，我記得有淺草社的羅石君先生，法學家李宜深先生，「論詩大稿」『李清照』的作者，張春林先生，朱大樽先生和我這幾個人。健看，他們的態度比較冷靜得多，沒有我們那樣的熱狂。

一個人看刊物看得久了，自己也想（不期說希望）有一些著作發表在上面去，這大概是人之常情。民國十四年的春天，我同我的哥哥到北平西便門外的二廟去，泛舟水上，足足地玩了一日，回來我便寫成了一首新詩「二廟紀遊」。其實我根本不曉得怎樣做新詩，也沒有讀過「新詩作法」這一類的書籍，不過把一些有詩意的句子分行寫出來罷了。並不告訴大爺他們，偷偷便寄投「農報副刊」。初意以為這一去，十有九層是石沉大海的，連底稿都沒有留。那知錯過了五天，那首詩居然登出來了，自己的名字印在報上，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當時歡喜得跳起來，大有「一登龍門壁價十倍」的樣子。那天我碰見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開口第一句，便問人家：

「你看見今天的『農報副刊』沒有？」

對方回答說「看見了，你有一首詩。」的確，我的心裏便好像開了一朵花。

以後，我又胡亂寫了幾首詩，寄到「農報」去，但是再也沒看見發出來。我才明白那一回不知道怎麼會碰了巧；自己的作品，事實上還不行轉報，不逢在朋友面前，我總裝出寫作十分愜意的態度來。

「怎麼樣久沒有看見你發表大作了呢？」有人這樣問。

「唉，監感哪里能够常常有。」我就這樣機智的躲閃開去。

同年我又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說「人力車夫」。那是師大附中國文教師梅仲符先生出的一個作文題目，我把這個題材寫成一篇比麻雀的鼻子還要短的，八百字的小說。梅先生不惟沒有改動幾個字，而且在尾批上着實誇獎了我幾句。我於是就趾高氣揚的起來，自己認為那是我的第一篇傑作了。「晨報副刊」候門似海，當然不敢再去「碰壁」，却把這個短篇很清楚地抄了一份，署了一個筆名，投寄「北平益世報」的一個新舊合璧的副刊「益世俱樂部」，不到一個星期，就刊載出來了，第二個月初，報館結算稿費，送通知單來，我居然有八角錢。這算是我寫作第一次得到報酬，心裏不由得想到：「原來寫文章，還是一個名利雙收的事業呢！」

三、辦刊物的失敗

我從中學四年級到現在，和友人們先後共辦過四個刊物，不幸都失敗了。自己這些年來始至終總是給人衣餓夥計缺少當掌櫃的資格。所以對於青年朋友們的辦雜誌，無不表示非常的同情。

我們的第一個雜誌「爝火」，是朱大煥先生取的名字，用「莊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的典故，由一個小小的文學團體編輯。會員總共十幾個人，當時我們採的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的辦法，撰稿者却只有朱大煥、李德吾、陳繼伯、徐伯瑜、王伯虎和我大人。第一期印

一千，銷路不惡，外省書店寫信來要的佔多數。錢却沒有收回來多少。第二期的封面，我們特請梁任公先生題字，並且還登了新社員趙景深先生的一個短篇「靜穆」。把印刷的數目減少至五百，不知道為什麼竟推銷不動了，出錢的幾個社員也紛紛請求退出，於是我們的經濟上便發生了很大的恐慌，印刷局屢次來向我們索取出二期的印刷費，我們總是藉口拖延，後來聽說他要具呈文向法院去控告我們的時候，才把大家駭壞了，李健吾先生慨然出來一方承當，答應徐徐地分期償還，還找了一家店舖擔保，事情才算和平解決，我當時在同人中最窮，出的錢最少。

過了幾個月，李健吾先生的朋友景梅九先生辦「國風日報」，我們得到機會，又在那裏附出一個「爝火旬報」，曠社又算是死灰復燃了。我介紹我的哥哥先達做了會員，他還翻譯了一篇居洛涅甫的中篇小說「愛西亞」登在上面。但是出了不到十期，我們的旬報又隨着報紙而壽終正寢了。

民國十六年，我們這班人雄心不死，另外大規模地組織了一個「海濤社」，會員多到三十位，由我起草宣言和擬定工作大綱，託「晨報副刊」編者翟世英先生代為披露，這一次的聲勢可以算得是比較浩大了，哪知道第一期的稿件送到張大元帥統治下的北平警察廳去註冊和審查，根本就通不過，而且連文章也被扣留了。我們當時的沮喪可想而知，社員看見風頭不對，立刻也就風流雲散。

民國十七年，因為黃魯安先生的介紹，北平文化總社答應，替我們出版一個半月刊「北京文藝」。沒有稿費，他們只管印刷發行。由我負責編輯，撰稿人只約了朱自清朱大粉李健吾右

評梅智鵝西湯鈞遠董魯安等幾人，出版了三期，內容也還相當精彩。趙景深先生在上海他主編的「文學週報」上，曾替我們大大地吹擂過一次，然而沒有想到這個書局是專門做教科書生意的，對於文化，根本就莫明其妙，把雜誌永遠堆在書店裏，不肯發行，也不肯登廣告。許多上海讀者寫信來購買，書店的老板總一味置之不理，理由是嫌地方太遠了。將來收賬麻煩。我們看見彼此間其勢是不能再合作下去，便自動地宣告和這位派頭十足的商人解除合同的關係。

這次我們雖然賣了很大的力氣，但是效果却等於零。自然，我個人所受的打擊，可以說，比任何人都來得大些。從此以後，我們大家只好把野心漸漸地收斂起來，遂決定將文章寄到北平或上海的各種期刊上我出路去了。

四、向艱苦的路途走去

我從開始學習寫作到現在，正式地算起來，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這一段時間，如果拿來和外國的文藝工作者比較，倒並不算太長；因為他們有許多人，是起碼幾十年才有一點收穫的。但在我自己如覺得練習的期間已經不能說很短了，到了今天，並沒有什麼可觀的成績，想起來，也算有點兒慚愧，雖然有不少人事上的糾紛，而職業太固定也是我的一種障礙，使我不能多方面地去體驗人生，把全副精神和時間用來致力於文學的研究與創作，但是根本我就沒有天才，恐怕這倒是原因之一。不過我對於寫作的興趣，却始終不曾減低過，十年來如一日，而且我對於寫作一句是抱著嚴肅的程度的，文學乃一寶與惡勢力惡社會戰鬥的武器，並非空子哥

兒們的遊戲消遣的工具，這一點我認識得十分清楚。

我的第一次投稿，得到小小的成功與喜悅，已經在第二節中敘述過了。現在要說是怎樣把這個事業繼續下來；換一句話說，就是我是如何向着這艱苦的路途走去。

在我投稿的初期中，我不得不遇到幾位認識或不認識的編輯先生的獎掖，並對他們表示感謝之忱。在北平益世報的「益世俱樂部」中刊登我的處女作「人力車夫」的編者是王芸渠先生。（後來王子約先生告訴我的）。我在那篇作品披露之後，曾經繼續向益世報投過幾次稿，也有採登的，也有原璧歸還的。但是王芸渠先生不久就到山東教書去了。他對我很表示好感，曾在後任左子約先生面前屢次推薦我的作品。所以在子約先生的編輯任內，我替益世報寫的或譯的文章數量很不少。嚴格地說，那都是些不成器的東西，我當時一律皆署筆名，至今我一編沒有存稿。它們的散失，我絲毫不覺得惋惜。不過借着這個機會，我却獲得了三種益處：（一）我慢慢地學會了觀察環境與捕捉印象；（二）我時常有練習寫作的技術的機會；（三）換得了一點稿費來購買我心愛的文學書籍。因為我那時既不肯用真名，而且「益世俱樂部」注意的人本來就少，所以並沒有取得什麼榮譽。

當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徐凌霄先生在京報主編「小說週刊」，我也會署真名去投遞兩三次稿，文章都得到發表了，只有一篇領過五塊錢的稿費。我還記得徐先生對我的每篇作品，都加上一些圈圈和「金聖歎式」的批註，真是有趣之至。那時京報館址在北平小沙土圍，距離學校很近。我曾去看過一次凌霄先生，他沒有在；以後，我也就沒有再去了。他對文學的見解，我不大贊同；但是他和他的兄弟一士先生合撰的「鵝策」。在「國聞週報」發文的時候，我却每

這都要讀的，它對我有一種極大的魔力。

同年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旬刊」由王統照先生擔任編輯，附在北京晨報上出版了。王先生選稿的態度慎重而公允，朱大樽李健吾兩先生和我都常常把詩和小說的習作寄去，他都把它刊載了，有時還給我們略略修改一些字句。這樣，便把我們這幾個年青人的寫作的興致鼓舞起來，很勤苦地不斷地寫下去。我們這班文藝青年為世所知，可以說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文學旬刊」並沒有稿費。我們得到的是比稿費更有價值的，一點小小聲譽。

這時樸伏闌先生（「晨報副刊」的編者）看見「文學旬刊」上時常有我們的名字，也肯發表我們的文章了。在副刊上，我們爲了「新某生體」和「算學與詩人」這兩個題目，曾和後來成爲白璧德的高足。批評家梁實秋先生及樸伏闌先生化名的恂伯打過兩場筆墨官司，執筆者是趙景深先生朱大樽先生鄭兆松先生和我四人。樸實秋先生那時正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常在他們的校刊上發表文章。他口口聲聲藐視我們，意思說我們是中學生，不配大言不慚高談文學。我們不由得大失所望，想不到原來研究學問還要分出階級來；然則梁先生，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大學生而已。他既然表示出這樣一種倨傲的態度，問題我們也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了。但是大家爲這件事，也頗受了一些刺戟，我和大樽立刻跑各家書店去買了不少的文學理論書籍來，埋頭苦讀了好些日子。

民國十四年（？）徐志摩先生到晨報去編輯副刊，我和他是舊識，他的父親和我的叔叔是很好的朋友，他特約我和朱大樽先生給「晨報副刊」長期撰稿。我們的苦難時代算是慢慢地過去了，大家這時才開始摸索到一點光明。沈從文先生也是在這個時期，和我們同在晨報發表作